

明清织绣品中鱼纹的艺术表征及其文化内涵

郭炤含，张晓霞*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7)

摘要:鱼纹历史悠久,因其造型丰富、取意吉祥,在明清织绣品中独树一帜,对其艺术表征及文化内涵进行探析,进而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纹饰艺术。采用文献研究及图案分析的方法,对明清织物和刺绣品中鱼纹的形态、造型、色彩特征进行归纳,分析其艺术特征并探讨其背后蕴含的民俗文化。研究表明,明清织绣品上的鱼纹具有题材寓意丰富、造型灵动、色彩鲜明、工艺精巧等艺术特点,它诠释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生殖崇拜、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吉祥文化,以及超脱世俗的“鱼乐”思想。

关键词:鱼纹;织绣品;艺术表征;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 5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4)01-0072-09

Research on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ish Patter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Fabric and Embroidery

GUO Zhaohan, ZHANG Xiaoxia*

(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7, China)

Abstract: As a longstanding decorative pattern, fish patter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embroidery are distinctive for their rich shapes and auspicious meanings. Analyzing the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fish patterns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decorative arts. This article employ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pattern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fish pattern's form, shape, and color characteristics of fish patterns in tapestry and embroidery. The study explores their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behind the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ish patterns on Ming and Qing Dynasty embroidery hav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ich thematic meanings, dynamic shapes, bright colors, and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They interpret the ancient Chinese fertility worship, the prosperous auspicious cul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transcendent "fish joy" philosophy beyond secular life.

Key words: fish pattern, textile and embroidery,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connotation

鱼纹是中华民族纹饰中重要的纹样之一,在远古时代的陶器上就已出现,是祖先结合现实生活,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用来表达美好愿望和感谢大自然馈赠的文化符号^[1]。织绣品上的鱼纹因其早期普及度低而较少被关注,到了明清时期,各式鱼纹在民间织绣品中的应用逐渐丰富,其独特的装饰特点和寓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文中在概述鱼纹流变的基础上,结合明清时期织绣品中鱼纹纹饰,解读其艺术表征和文化意蕴。

1 鱼纹的历史溯源

人类与鱼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那时人们通过渔猎来获取生活资料。在渔猎中古人发现鱼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因而认

收稿日期:2023-09-27; 修订日期:2023-12-15。

作者简介:郭炤含(1999—),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张晓霞(1972—),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纺织品艺术设计、美术考古。

Email: zxx_ddm@126.com

为吃鱼不仅能让人们饱腹,还可能让他们也具有极强的繁殖力,于是鱼逐渐成为古人物与精神的双重寄托,更有许多部落将鱼作为图腾,那些刻画在岩石等自然物上的鱼形图腾便是早期的鱼纹雏形,并慢慢出现在石器和陶器上。

从商周到秦汉,鱼纹逐渐以单独纹样的形式装饰在器物上,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衍生出许多新的风格,但受到农耕经济及龙纹的冲击,其不再呈现原始时期的兴盛态势。汉代,以鱼纹作为纹样的织物虽存世较少,但从新疆罗布泊高台古墓出土的鱼蛙纹锦(见图1)可以看出,当时双鱼纹样已被作为织物装饰图案。图1织物是平纹经锦,棕色地上以橙黄显双鱼纹,以蓝色显蛙纹,上下并行的蛙和双鱼间隔排列,造型古朴雅拙,这是目前出土的最早的鱼纹织物。值得一提的是,古人认为蛙的叫声像婴儿啼哭,肚子像女性子宫,从而蛙成为其生殖崇拜的代表性动物,蛙与鱼组合是对子孙绵延的祈盼。



(a) 实物图



(b) 复原图

图1 新疆罗布泊高台古墓出土东汉鱼蛙纹锦

Fig. 1 Fish and frog brocade unearthed from Gaotai ancient tomb in Lop Nur, Xinjiang

隋唐至元代金银器、瓷器等新兴载体的出现,使鱼纹得以兴盛。但由于唐宋时期植物纹在织物上大流行,同时,因鲤与李同音,鲤是鱼的代表,鱼在唐代被视为贵族的象征,导致鱼纹在织物上的普及程度受限。整理相关文献发现,这一时期仅有两件辽代鱼纹织物面世,一件是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百纳丝织品(见图2),这件织物属于百纳的一部分,为辽式纬锦织物,其纹样中心为正视的花卉图案,周围围绕4条游鱼,鱼头两两相对,鱼身整体呈菱形,空隙处以十字宾花点缀;另一件是香港贺祈思收藏基金会收藏的刺绣联珠莲花双鱼纹丝织品(见图3^[2]),此件织物纹样为圆形构图,周围一圈联珠纹环绕,中心位置驿式双鱼置于莲花底座上,鱼身十分饱满,纹样上部为伞盖图案。从构成元素看,隋唐至元代的鱼纹已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a) 实物图

(b) 复原图

图2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辽代百纳丝织品

Fig. 2 Liao Dynasty Bainan silk fabrics from the Cleveland Museu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图案整体



(b) 图案局部

图3 辽代刺绣联珠莲花双鱼纹丝织品

Fig. 3 Embroidered lotus double fish silk fabric of Liao Dynasty

明清时期,鱼纹的载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包括织绣、瓷器、砖雕、建筑、家具、剪纸、年画等。在民族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人们摆脱旧制,开始描摹自然中鱼的形态,同时注重鱼纹的装饰性和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民间艺术的新星。

纵观鱼纹的发展,其萌芽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图腾,发展于商周到元代,普及于明清时期,并逐渐在民间推广与运用。

2 明清织物与绣品中的鱼纹艺术表征

受到生产方式与成本的限制,织锦类织物的生产集中在官办和民办的织造局中,相比之下,刺绣在民间的普及度更高。因此,鱼纹在织物与绣品上呈现的造型和色彩有所不同,总体上看,织物鱼纹整体秩序感更强,刺绣鱼纹更具艺术感,抽象而灵动。

2.1 题材

明清时期传统吉祥符号发展已比较完整,并借助象征、谐音传达吉祥喜庆的寓意。鱼纹造型有着流线型的美感,为了达到织绣品视觉上的赏心悦目和寓意上的吉祥圆满,通过单独纹样或者与其他纹样组合的形式,来实现织绣品纹样造型美观和内涵丰富的目的。

明清时期,织绣品中的单独鱼纹纹样主要以鲤

鱼和金鱼为主体,将鱼绣织在荷塘或者流水浪花的底纹上,展现鱼肆意游弋的状态;在寓意的表达上也较为单一,主要取谐音构成吉祥寓意,鱼谐音“余”“玉”,“金玉满堂”纹样展现的是金鱼在水中自由玩耍的场景,表达了国家安定、百姓安乐的局面。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落花流水鲤鱼锦,在落花流水纹基础上,增加了杂宝纹和鲤鱼纹,水波和鲤鱼相映成趣,使落花流水锦在充满清新雅致的诗歌意蕴的基础上,增添了祈求吉祥的内涵。

明清织绣品中的复体鱼纹组合则更为丰富,有5种代表性的题材组合。

2.1.1 鲤鱼与龙 自古以来,“龙”的形象与鲤鱼形象关系密切,侧面反映了人们对鲤鱼这一形象的崇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鲤鱼跃龙门”纹样(见图4^[3]),多被绣在荷包上,表达对家人金榜题名的祈盼。



图4 清代鲤鱼跃龙门荷包

Fig. 4 Carp leaping from dragon gate bags in Qing Dynasty

2.1.2 双鲤鱼纹 清代双鲤鱼纹织物通常将鲤鱼面对面做八字形斜置(如图5^[3]),造型源于汉代“鱼书”的形象。在乐府诗集《饮马长城窟行》中有一首五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诗中“双鲤鱼”指夹着书信的刻成鲤鱼造型的木板,后来“双鲤”就成为书信的代称。明清时期,双鲤鱼纹应用在织物上时常与海浪纹、云纹、佛手石榴等组合,寓意美好的祝愿与寄托。



图5 清代双鲤鱼织物

Fig. 5 Double carp brocade in Qing Dynasty

2.1.3 鱼纹与八宝纹 由于鱼的眼睛可以透过浑浊的河水看清前行的道路,所以在佛教中被视为“慧眼”的化身。八吉祥中的宝鱼纹代表佛的眼睛,

象征着自由和解脱,与其他7个吉祥器物相结合,例如宝盖和吉祥结等,共同展现着佛教中独特的吉祥文化(见图6)。



图6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八吉祥纹绦

Fig. 6 Eight auspicious pattern twill of Ming Dynasty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2.1.4 鱼纹与杂宝纹 鱼纹还与花篮、铜钱、方胜、葫芦、芭蕉扇等组成杂宝纹,是典型的器物装饰吉祥纹样(见图7),其中鱼纹代表丰收与富足。



图7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补子

Fig. 7 Qing Dynasty embroidered patch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2.1.5 鱼纹与莲纹 金鱼纹在织绣纹样中常与莲花纹相配,取名为“金玉连发”,寓意财运不断;另外,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中阐释:“用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等于说男与女戏。”鱼莲纹暗含了生殖崇拜的思想(见图8^[4]),表达着人们子孙延绵的心愿。



图8 清代遮眉勒

Fig. 8 Eyebrow curtain from the Qing Dynasty

2.2 构图与形态

2.2.1 织物鱼纹样式更富有动感 织机生产具有机械性,使织物纹样重复排列,形成特有的节奏感和律动感,这种利用工艺局限织造的具有工艺特色的样式,是其他技艺不可替代的^[5]。

随着明清织造技术的提升,织物纹样发展进入了巅峰时期。鱼纹织物纹样的骨架多样,可适应各类型纺织用品的需求,另外,在骨架细分上,鱼纹织物纹样骨架也别具特点,具体见表1。表1中鱼纹织物骨架主要有3种形式:①鱼纹与条带样式结合,有正位骨架条带形鱼纹(见表1中1[#]^[6])和错位骨架条带形鱼纹(见表1中4[#]^[6])两种主要形式,在直线型结构的纹样中加入了鱼身为曲线的鱼纹,显

得稳重但不沉闷;②鱼纹与散点样式结合(见表1中3[#]),鱼纹以点的形式出现,通过视觉追逐形成线感甚至面感,给人延伸感和想象空间;③鱼纹与波形样式结合,即同一个单元内上下两个元素自成圆形闭环(见表1中2[#]^[3]、5[#]),将鱼身的曲度融入织物横向与纵向的曲线骨架,给人鱼在波浪中畅游的视觉感受,展现自由豁达的韵味,也丰富了织物纹样结构的动势。

表1 明清鱼纹织物纹样骨架

Tab. 1 Framework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fish-patterned textile

序号	骨架类型	名称	骨架模式	纹样图例
1 [#]	正位骨架	银灰地曲水鱼藻纹锦 (清)	上 上 上 上 止 止 止 止 上 上 上 上 止 止 止 止 上 上 上 上	
2 [#]	错位骨架	蝴蝶金鱼纹织锦 (清)		
3 [#]	错位骨架	深蓝色地杂宝纹织金缎 (清,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4 [#]	双层骨架	蓝地福寿双鱼纹织物经皮 (明)		
5 [#]	双层骨架	鲤鱼戏水落花纹织金缎 (明,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2.2 刺绣鱼纹装饰性更加明显 刺绣的工艺限制相对织物较小,普通劳动妇女也可独立制作,使刺绣鱼纹展现出了更多的民间性和随意性。民间各式各样小件绣品中的鱼纹非常最具特色^[7],鱼纹造型、构图、色彩受到的制约较少,显得丰富灵动。

手工刺绣鱼纹的构图非常灵活,主要有单独式、适合式和散点式3类,具体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单独式刺绣鱼纹通常以小面积点缀在绣品

上,有对称和均衡两种表现形式,并通过金线勾勒或者亮片绣丰富其视觉效果(见表2中1[#]^[8]、2[#]^[3]);适合式刺绣鱼纹有团状适合和条状适合两种形式,以适应刺绣区域的外轮廓(见表2中3[#]^[8]、4[#]^[3]);散点式刺绣鱼纹由于工程量较大,实物相对较少,但散点对称式鱼纹的装饰性极强(见表2中5[#]^[3])。明清绣娘们创作了丰富的刺绣技法,纺织品上的刺绣鱼纹主要使用盘金绣、打籽绣、平针绣等绣法。

表2 明清刺品中绣鱼纹构图

Tab. 2 Composition of Ming and Qing embroidered fish patterns

序号	构图类型	具体形式	名称	纹样图例
1 [#]	对称式		双鲤宝盖鱼纹绣片 (清)	
2 [#]	均衡式	单独式	鱼藻纹绣片 (明)	
3 [#]	团状适合		红色晋绣肚兜 (清)	
4 [#]	条状适合	适合式	金鱼纹刺绣旗装 (清)	
5 [#]	散点式	散点对称	金鱼纹刺绣旗装 (清)	

2.3 造型

2.3.1 织物鱼纹的造型更显古朴 鱼纹作为织物图案时,常见的造型主要有双鱼纹和流水鲤鱼纹两种。

明清双鱼纹织物通常将鱼面对面做八字形斜置,通过这种对称而饱满的艺术表现形式传达吉祥与福寿有余的含义,成为独特的吉祥符号。由于创作工具和载体的局限,从最早出现鱼纹的新

石器时代一直到唐代,鱼纹在各种载体上都以简洁而传神的扁平化造型为主,并且象征着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的鱼纹多为庄重质朴的形象,讲究对称,并对鳞、鳍等细节刻画较简洁。直到宋代人文画兴起,鱼的造型才逐渐脱离了古拙的形象,形成写实性与装饰性并存的艺术风格,但由于古拙形象流行时间较长,覆盖载体较广,在后代的鱼纹造型中仍有出现。明清时期织物中出现的鱼纹造型见表3,

其中表3中1[#]双鱼纹呈八字形的造型,保留了早期象征庄重神圣的鱼纹造型。

明末清初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观念更为开放,士大夫多追求雅致脱俗、自由豁达的境界,鱼纹的造型随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落花流水游鱼锦”。落花流水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先有唐诗:“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后有宋词“落

花流水红”,在装饰纹样中表现为锦上装饰水波图案,水波间以单朵梅花或桃花及其折枝形态点缀,通过艺术创作将这一意境具象化。落花流水锦上鱼纹造型呈扁长状,且着重刻画头部以及鳞片和尾巴,使鱼的整体形态更为丰满,动态上呈“C”形或“S”形,与以往鱼身呈直线型或简单的动态不同,表现出鲤鱼自由跃动的形象(见表3中2[#]、3[#]和4[#]^[3])。

表3 明清织物中的鱼纹
Tab. 3 Fish patter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brocade

序号	名称	实物图例	纹样图例	色彩提取
1 [#]	福寿有余子孙万代织金锦 (明,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2 [#]	鲤鱼戏水落花纹织金缎 (明,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 [#]	落花流水鲤鱼织金缎 (明,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4 [#]	落花流水鲤鱼锦 (明)			
5 [#]	红地织金吉庆双鱼妆花缎 (清,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2.3.2 刺绣鱼纹的造型更具灵动 刺绣品中的鱼纹受施绣者主观审美影响较大,较织物中的鱼纹显得更为灵动,刺绣中的鱼纹造型见表4。明清刺绣工艺发展达到顶峰,随着明清时期装饰技艺的提高和审美认识的加深,除了常见的画绣(见表4中1[#]^[3])和平针绣(见表4中3[#]^[4])中的写实鱼纹外,抽象的鱼纹图案出现在刺绣品中,反映了人们在频繁制作动物纹样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了对装饰图案

的抽象能力、提炼能力和审美认知^[9]。刺绣鱼纹造型和工艺简化,也使刺绣品成本降低、产量提升。另外,随着民间小件织绣品的普及,绣娘们每天重复刺绣类似的纹样,使她们创作时极其熟练且略带随意,并能抓住纹样造型的本质,对画面进行主观处理,用更为简洁而巧妙的形式来表现鱼纹。同时,鱼纹造型辨识度高、特征明显,人们都能识别并接受其简洁造型(见表4中4[#]^[4]、5[#]^[4])。

表4 明清刺绣中的鱼纹
Tab. 4 Fish patter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embroidery

序号	名称	实物图例	纹样图例	色彩提取
1 [#]	鱼藻纹绣片 (明)			
2 [#]	金玉满堂纹绣片 (清)			
3 [#]	鱼戏莲纹刺绣枕顶 (清)			
4 [#]	鱼戏莲纹平针绣暖耳 (清)			
5 [#]	鲤鱼跃龙门纹绣片 (清)			

2.4 色彩

2.4.1 织物鱼纹的色彩更加协调柔和 织物中的鱼纹大多采用暖棕色系。图案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不仅需要通过表现形式及构图方式传达给人们,还要结合色彩进行表达^[9]。从表3中可以看出,明清鱼纹织物多使用褐色、黄棕色、红棕色等作为织物底色,将与底色相近的暖色作为鱼纹色彩,并局部增添月白、深蓝、明黄、黑等色彩作为辅助色,色调协调统一,极富美感。织物中的鱼纹大多与杂宝纹、佛教宝鱼纹相关,其沉稳大气的配色塑造了敦厚而古朴的鱼纹形象,与刺绣鱼纹色彩相比,给人更强烈的秩序感和稳重感。

织物中选用的色系相对较少。鱼纹织物通过纹样用色与底色的不同形成图案,其体量大且单个纹样的刻画较平均,使得在织物色彩日趋丰富的背景下,鱼纹更多地作为一个色块与织物整体色彩相协调。鱼纹本体少则一色,多则三五色,大多在鱼鳍、鱼尾处使用点缀色,达到柔和且富丽的效果。

2.4.2 刺绣鱼纹的色彩更加艳丽明朗 刺绣鱼纹用色更为丰富鲜艳,且色域宽广。刺绣是对织物的二次艺术创作,起到加强视觉冲击力,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刺绣鱼纹的色彩艳丽而明朗,与织物本身色彩鲜明度相差较大。明清时期,受到科技发展、染色技术进步等影响,刺绣坊所用色线的色彩层次极为丰富,合计有六、七百种之多。染料生产的大发展,为明清刺绣鱼纹的色彩表现提供了极大的丰富度、灵活性和艺术创造性。由表4图例可以看出,鱼身除了中国传统五正色“青、赤、黄、白、黑”外,还有以绿色为主体色的,色彩鲜明,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其他组合纹饰则选用与主体呼应的颜色和少量补色,整体为具有民族感的高饱和度色调,营造了喜庆而热烈的氛围,浓郁的色彩给人带来生活幸福、收获丰盈的美好感受。

刺绣鱼纹常采用金线勾勒边缘。金线在纹饰中可作金黄色使用,起到点睛的效果,同时其富丽的光泽与活泼好动的鱼形象相得益彰。由表4中2[#]^[3]可以看出,饰金的刺绣有从贵族走向平民化的变化趋势,金线勾勒的金鱼纹不仅给人视觉享受,更满足了人们心理层面的需求。

3 明清织绣品中鱼纹的文化内涵

3.1 生殖崇拜

鱼因其腹内多子,繁殖力强的特性,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多子多福的思想相契合,成为生殖力的象

征。在明清织绣品中,“鱼戏莲”这图案以鱼莲暗喻男女之间喜爱之情,“双鱼骈游”暗寓女阴崇拜,均是对传统生殖崇拜思想的表达。

3.2 吉祥寓意

明清时期,以鱼纹作为吉祥纹样装饰的绣品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寓意丰富,流传甚广。用鱼纹表达吉祥的艺术方法主要为象征法和諺音法^[10]。

3.2.1 象征法 汉代鱼被视为丰收吉庆的代名词,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提及:“昆明池刻玉石为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鬚尾皆动。”有鱼则有水,雨水丰沛则庄稼成熟,两者的密切关系使鱼被视为象征丰收的祥瑞之物。明清织绣品中,鱼纹延续了这种吉祥寓意,代表了富足喜庆。另外,在传统文化中,“龙”是神圣而尊贵的象征,而鱼则被视为龙的前身,李白在《赠崔侍郎》写道:“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我国有鲤鱼越过龙门就会变成龙的传说,后人用此比喻仕途平步青云,事业飞黄腾达^[4]。鲤鱼跃龙门成为古人荷包上的重要装饰题材,承载了人们对学子中举、家人升官的期待与祝福。

3.2.2 諺音法 由于汉字是单字、单音、单义,同音对应多字,“鱼”与“余”“玉”同音,鱼便被很自然的与幸福和富裕联系起来,并与其他具有吉祥意味的动植物相结合,如童子、蝴蝶、牡丹莲花灯,延伸出了“金玉满堂”“连年有余”“富贵有余”等一系列吉祥祝福(见表4图2[#]^[4]),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凝结着古代智慧与文化的吉祥符号。

3.3 “鱼乐”思想

从古至今,鱼都是自由的代名词,它们长于水而乐于水,是文人士大夫们追求的理想状态。庄周云:“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表达了物我两忘,自由从容的生活态度,不为世俗观念所影响,从而实现自我价值^[11]。鱼在佛教中被视为自由豁达、超脱世俗的象征。另外,明代以后,单纯诗意的情调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吉祥趣味的追求,故而在波浪纹锦中添加鲤鱼造型,生出了鲤鱼戏水落花纹^[12],增加吉祥意味的同时表达了对自由豁达境界的向往。

4 结语

明清织物与刺绣中的鱼纹有着各自独特的艺术特征:织物中鱼纹受工艺影响,显得富有秩序感,造型呈现传统、古拙的形态,色彩上强调与整体色调的融合,显得沉静娴雅;刺绣工艺灵活且绣法多

样,使刺绣鱼纹具有浓厚的装饰意味,在传统造型的基础上融入了抽象的造型手法,通过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了灵动可爱的鱼纹形象,色彩上以中国传统五色为基础,搭配鲜艳亮丽的色彩,摆脱了传统鱼纹单一的配色。

织绣品中鱼纹的象征性是多向的、并行的。它有着3个层次的文化内涵,分别是生殖繁衍的崇拜,对吉祥喜庆的期盼,对自由境界的不懈追求。

鱼纹在纺织、服饰等领域仍会有一定的创新发展,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未来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会更关注鱼纹的形式美和意蕴美。虽然鱼纹在流变的过程中象征意义会有所弱化,但其将成为一种以装饰性为主要价值的纹饰,可为当代纺织、服饰等领域创新设计提供纹样素材。

参考文献:

- [1] 周科. 民间服饰中的鱼纹样[J]. 科技信息(学术研究), 2008(32): 617.
ZHOU Ke. Fish patterns in folk costumes [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cademic Edition), 2008 (32): 617. (in Chinese)
- [2] 赵丰. 中国历代丝绸艺术·辽金[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137.

出版社, 2021:137.

- [3] 高春明. 中华元素图典·传统织绣纹样·花卉虫鱼 [M].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104, 108, 110, 123, 127, 186.
- [4] 邝杨华. 中国历代丝绸艺术·民间刺绣[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45, 73, 100, 102.
- [5] 张爱丹. 中国丝绸织物纹饰的美感特质与演变 [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23.
- [6] 宗凤英. 明清织绣[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45.
- [7] 梁惠娥,傅茗琪. 传统女性肚兜中的生殖符号[J]. 服装学报, 2022, 7(1):29-34.
LIANG huie, FU Mingqi. Reproductive symbols in traditional female bellyband [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2, 7 (1): 29-34. (in Chinese)
- [8] 俞晓群,王露芳. 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小件绣品卷[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32, 135.
- [9] 赵本钧. 简论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的图案化、抽象化及表现化特点[J]. 皖西学院学报, 2013, 29(1):113-117.
ZHAO Benjun. On the rules of decorative arts patterning, abstraction and expression in ancient China [J]. Journal of West Anhui University, 2013, 29 (1) : 113-117. (in Chinese)

(责任编辑:卢杰)

(上接第64页)

- [63] 金立. 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J]. 文物, 1976 (6): 69-75, 102-103.
JIN Li. A trial interpretation of bamboo slips of Han tomb No. 8 in Fenghuangshan, Jiangling [J]. Cultural Relics, 1976 (6): 69-75, 102-103. (in Chinese)
- [64] 孙晨阳,张珂. 中国古代服饰辞典[M]. 北京:中华书局, 2015.
- [65] 王聪.《仪礼·聘礼》仪节复原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017.
- [66] 陈军. 仪礼[M]. 合肥:黄山书社, 2016.
- [67] 杨天宇. 仪礼译注[M]. 新1版.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68] 张亮. 周代聘礼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13.
- [69] 李志娜.《仪礼》郑注考[D].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 2011:75-76.
- [70] 吕梁. 褐袭礼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9: 19-20.
- [71] 王聪.《仪礼·聘礼》仪节复原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017.
- [72] 彭林. 仪礼全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 [73] 李志娜.《仪礼》郑注考 [D]. 北京:北京语言大

学, 2011.

- [74] 王锷. 三礼研究论著提要[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1.
- [75] 陈直. 居延汉简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
- [76] 陈直. 居延汉简概述[J]. 历史教学, 1962(4): 2-4.
CHEN Zhi. Overview of Juyan Han bamboo slips [J]. History Teaching, 1962(4): 2-4. (in Chinese)
- [77] 陈公柔,徐莘芳. 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J]. 考古, 1960(1):45-53.
CHEN Gongruo, XU Pingfang. On the discovery and study of the Juyan Han Jian [J]. Archaeology, 1960(1):45-53. (in Chinese)
- [78] 黄今言,陈晓鸣. 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7(1):86-102.
HUANG Jinyan, CHEN Xiaoming. Discussion on the scale of border defence forces and the costs of maintaining them in the Han Dynasty [J]. Research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1997(1):86-102. (in Chinese)
- [79] 黄云眉. 史学杂稿订存[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 [80] 丁凌华. 中国丧服制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卢杰)